

吐蕃东境（鄯）五道节度使研究^{*}

朱悦梅

节度使制度是吐蕃王朝军事扩张过程中，在吐蕃部落制度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管理区域化、集团化的结果。吐蕃东境（鄯）五道节度是吐蕃政权针对唐朝河湟及以远地区部署的军事单位，有独立的建制体系。吐蕃东境（鄯）五道节度使是吐蕃诸节度使之一，随着军事占领区域的延伸，吐蕃东境节度使辖下又分出吐蕃北道节度使、吐蕃南道元帅所辖军事区域等。吐蕃东境五道节度所辖五道分别为河州、鄯州、青海、雅莫塘、玛曲等节度（khrom），各道节度当有各自的军衙驻地。

关键词 唐代 吐蕃 军事 职官制度 东境（鄯）节度使

作者朱悦梅，1969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兰州市西北新村1号，邮编730030。

作为一级重要的军事建制，吐蕃的节度使制度颇受学界重视，但由于史料既匮乏且零散，加之记载互有抵牾，长期困扰吐蕃制度史、军事史的研究。随着西域、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出土与刊布，吐蕃军事建制 Khrom 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者众多，逐渐将之与节度使这一军事建制结合起来，有助于厘清吐蕃节度使制度的层级问题。^① 王尧、陈践先生曾提示将吐蕃东鄯（境）五道节度使与通颊（mthong khyab）五千户联系起来考虑。^② 戴密微先生解释“道”为吐蕃帝国行政和军事大区的中心之一，即汉籍中之“节度”。^③ 金滢坤先生认为吐蕃在其东、北、南、西及陇山以西的广大边境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使，分别为东境五道节度使、南道节度使、东道节度使、河西道节度使，各节度使又分领诸小节度使。^④ 后来又指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吐蕃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研究”（09BZS039）、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唐代吐蕃历史军事地理研究”（09XB07）阶段性成果。

① 匈牙利学者乌瑞释之为“军镇、军衙”（military government）（荣新江译：《KHRUM（军镇）：公元七至九世纪吐蕃帝国的行政单位》，《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杨铭先生译作“节度使”（《唐代吐蕃统治鄯善的若干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日本学者山口瑞凤译为“军团”（《以沙州汉人构成的吐蕃二军团的成立与 mkhartsan 军团的位置》，《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研究纪要》1981年第4期；汉译文见易明译：《沙州汉人二军事部落的成立》，《国外藏学动态》1987年第2期）；王尧、陈践先生解释为“行军衙”、“将军”（《吐蕃兵制考——军事部落联盟剖析》，《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马德先生指出此机构只出现在吐蕃新占领区（边境地区），为依照唐制设置的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及委派的统治者，可直译为“节度衙/节度使（都督府/都督）”（《KHRUM 词义考》，《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② 王尧、陈践编：《吐蕃间牒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③ [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359页。

④ 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的名称有所变化,其东境五道节度使后因松州成为治所而改称“松州五道节度使”。^①杨铭先生则认为吐蕃“东境五节度大使”为指挥河陇地区的五节度使,与藏文文书中的 khrom chen po 对应,其驻蹕地在河州。^②林冠群先生通过对吐蕃军事建制的总结性研究,指出吐蕃的5个“bde blon khrams po”为边疆大臣所统的五区,分别为东、西、南、北四道节度加上原有的青海地区,是吐蕃长期推行的体制,而非仿自唐朝。^③学术界对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及其所辖区域见仁见智。本文不揣谫陋,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吐蕃军事地理扩展及节度使制度与吐蕃早期军事防戍体系的关系出发,探讨其源流、辖域,就五道节度使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的层级脉络提出个人一得之见。

一、“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及其设置

“吐蕃东鄙（境）五道节度”是汉文史籍中多见的名称,王尧、陈践先生据此将写卷 P. T. 1287 第 521—524 行中出现的 so blon sde lnga 对译作“五道节度大使”;林冠群先生指“节度使”制度的成立要晚于 so blon sde lnga 在吐蕃的出现,故这种对译不甚妥当,并直译为“边疆大臣所统五区”。^④笔者以为,王、陈二先生的对译符合唐代史官的理解,而唐代的汉地史官运用中原王朝职官对应翻译,表明它们在性质上应当有一定的可比性。正史中对这一吐蕃节度名称的惯常性使用,就是最好的诠释。

（一）史料中所见的“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及其职掌

“吐蕃东鄙（境）五道节度”,史书中多有所见。如《旧唐书·韦皋传》载:“于是寇灵、朔之众引而南下,赞普遣论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而来解维州之围。”《旧唐书·吐蕃传》载,贞元十八年(802)正月:“吐蕃以其众外溃,遂北寇灵、朔,陷麟州……自八月至于十二月,累破十六万众,拔其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一万余级,遂围维州。救军再至,转战千余里,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资治通鉴》贞元十八年(802)正月条亦有相同的记载:“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全唐文》载白居易《代忠亮答吐蕃东道节度使论结都离等书奉敕撰》:“大唐四镇北庭行军泾原等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丹阳郡王朱忠亮致书大蕃东道节度使论公、都监军使论公麾下。”《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和》记:元和七年(812)“二月,吐蕃东道节度论诹都、宰相尚绮心儿以书遗凤翔节度使李惟兰,惟兰奏献之。”

“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东鄙五道节度使”、“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大蕃东道节度使”,是汉文史籍中唐朝对吐蕃东部作战区域总指挥官的称法,从其名号看,包含了以下几条信息:

第一,所谓“东鄙五道节度使”等,均为吐蕃东部疆域的作战指挥官,“五道”是东境

① 金滢坤:《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与吐蕃文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4页。

③ 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④ 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的五道，如若整个“东鄯/东境”为一级作战军区的话，则这一作战区域内部节制着五个次一级的军分区。

第二，唐朝史官使用“节度使”名称，表明至少在唐朝人看来，要将其看作一个大的作战军区的最高首脑，其职掌与唐节度使相当。

第三，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同时兼“都群牧”。“群牧”，反映了吐蕃军事部落制的社会生活特征，^① 可以理解为吐蕃在其新的军事占领区，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军事、生产、管理合一的社会生产方式。

第四，吐蕃的节度使是由内大相兼任的，这一点与早期内大相身处赞普之下群臣之上，统管全部内政外交与对外军事的职掌权限相符。

由以上内容可推断，吐蕃王朝在对外扩张过程中，随着军事锋线的扩延，已经分区作战，即全部军事作战区域不可能同时由一个作战指挥部门统筹。在这种情况下，由内大相统军来组织一个或几个方面军事区域的作战安排。这种变化，可以史籍中出现的诸如“大蕃河西北道节度”、^② “吐蕃中节度”^③ 等平行军事单位名称为其佐证，并可以进一步通过在吐蕃东境五道节度辖域内出现的若干吐蕃节度的名称及涉及吐蕃军事进程的一些记载，推知吐蕃东境五节度的大致军事职掌与地理范围。

（二）吐蕃东道节度使设置的时间

吐蕃节度出现的时间，以《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第三》所见为最早：“自其王弃宋弄赞唐太宗贞观后吞并诸蕃，地方千里，每十节度置一上相统之，自号吐蕃。”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其时吐蕃为部落军事联盟制，实行的是五如六十一东岱的部落体系，节度建置是吐蕃在其腹地以外新占领区设置的一种独立掌管军政区域的机构，故引文中所言“每十节度置一上相统之”之说恐为唐朝史官将吐蕃的部落单位与唐朝的节度相对应的一种说法，其实当时并未有节度使之设。节度使是吐蕃军事地理扩展过程中逐步出现并最终体系化的。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 P. T. 1287《赞普传记》记载：“唐之元帅王杰尚书驱使唐军越境前来，吐蕃元帅论钦陵以战谋驱唐人如驱宰牦牛，在果瓦列阵交战，痛击唐军多人，于尸骸中朝天倒立一具……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记。达拉山之‘汉墓’与黄河边之‘汉墓’实由此而得名也。自阿若卜以远，娘……道尔保等地王子与庶民均已收抚，归为编氓。并建五道守卫大使。”^④ 这里的五道守卫大使即 so blon sde lnga，王尧先生原译之为“五道守卫大使”。^⑤

与上述记载相同的内容在《敦煌吐蕃历史编年》中被系于羊年，即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大论钦陵赴吐谷浑，于达拉甲都尔与唐将王尚书作战，杀死许多唐人。”^⑥ 金滢坤先生根据这条记载，以及《旧唐书·吐蕃传》等汉文史籍所记王孝杰战败素罗汗山之事，考证“吐蕃在万岁登封元年（696）就开始在新占领区设置五道节度大使，其范围包括郭州

① 参见朱悦梅：《吐蕃王朝军队给养方式探蠡》，《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② 《全唐文》卷674《代王伋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

③ 樊绰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2《山川江源》，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页。

④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汉译文第123页，藏文第43页。

⑤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

⑥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译文第91页，藏文第7页。

等北方与南方诸小邦,涉及到唐、吐谷浑、南诏、唃末、羌等周边国家与部族。”^① 这可以视为吐蕃设置“五道节度大使”上限的最保守推测,可备一说。而如果翻检古藏文文献,节度使之置恐出现得更早。《吐蕃历史纪年》676年条载:“论赞悉诺引兵赴突厥,于乞力肖斯城设 khrom (节度)。”^② 但是,这里的 khrom 亦为已经设置了机构,是故 so blon sde lnga 与 khrom 的设置当更早。

王孝杰在素罗汗山之败,时当万岁登封元年(696)。是时吐蕃扩张区域尚局限于河湟吐谷浑故地,由于这里民族成分的独立性和地理区位的特殊性,吐蕃在这里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其政治管理制度的延伸。so blon sde lnga 这一有军事特征(so为“兵、军”之意)的sde(部落)很可能就是后来“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的雏形,即“东境(鄙)”大区下的五个分区。因此,至7世纪末在河湟地区摆开阵式与唐军作战,并以so blon sde lnga的建制实现军事战略战术的布局,表明吐蕃的军事建制体系始终是有序而健全的。庶几可定,在公元696年之时,吐蕃在这一区域的“五道节度大使”及其职官体系已经存在,且在有效的运行当中。

吐蕃东道节度自设置起,结束于吐蕃王朝分裂。史载,大中三年(849),吐蕃宰相论恐热杀东道节度使,奉表以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木硤等七关降唐。^③ 大中三年可视为“吐蕃东道节度使”使命的终结时间。

(三) 吐蕃节度使的特征

吐蕃王朝自完成统一青藏高原开始,锋芒即指向西域、洱海与河湟地区,分别与大食、南诏和吐谷浑等纷争,紧接着开始与中原的唐王朝争夺利益。随着“五道节度大使”在河湟地区战事的发展,吐蕃还同时开辟了西域战场,并设置了如林冠群先生所言的吐蕃“西道节度使”。^④ 长安三年(703),吐蕃攻陷洱海地区,建立了“吐蕃中节度”。^⑤ 随着吐蕃对唐战场的拓展,最初位于河湟战场的“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又向北部的河西、东部的关陇、东南部的剑南西川等地区发展,形成新的军事地理单元,进而促成分区域作战局面的出现,于是吐蕃以东面进攻唐关内道的力量承袭原河湟战区的“东境节度使”建制,在新占领的河西地区设置了“河西北道节度使”,在剑南西川地区设立“松州五道节度使”(文献中出现的可与之对应的职官名称为“吐蕃南道元帅”)。因之,吐蕃在对外扩张的锋线战场,就由原来的吐蕃西、东、中三道节度,进而发展为西、东、中、北、南五道。

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中分出北道和南道后,北道有时与东道共由同一大相节制。《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和》有记:开成二年(837)“十一月天德奏吐蕃东、北道元帅论夷加羌使信物及木夹到本道,以其书信上闻”。这里的“吐蕃东、北道元帅”,即是作战方向分为五道之后,由论夷加羌统领东、北两大战区。东境五道节度始终是吐蕃军事力量中的重要一支,敦煌汉文吐蕃文献中即多有“东军”一称的出现,如S.6315《愿文》中有“东军宰相

① 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9页。

③ 《资治通鉴》卷248,唐大中三年三月。两唐书《吐蕃传》略同。

④ 林冠群:《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之研究》,《中国藏学》2007年第4期。

⑤ 参见朱悦梅:《吐蕃中节度考》,《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

大论”、S. 3256《愿文》中有“东军尚相”、S. 2146《行军转经文》中有“我东军国相论掣脯”等等,^① 这里的“东军”显然就是吐蕃东境节度的省称。

吐蕃节度使一级军事建制,是吐蕃军事部落联盟制与唐朝军队作战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制度。随着吐蕃军事战略地理的扩大与清晰,军事化程度加深,战场的划分成为必要,且各自的独立性亦会有所提升,吐蕃节度一级的军事建制自然会日趋成熟并自成体系。由于其与唐朝节度使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可比性,故成为唐朝史官笔下的习惯性称谓。

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是不是上文所述的吐蕃西、东、中、北、南五道呢?显然不是。上文所论王孝杰在素罗汗山之败是在万岁登封元年(696),是时吐蕃扩张区域尚局限于河湟吐谷浑故地,尽管吐蕃于永隆元年(680)在西域与唐安西都护府的争夺中一度占优,并对西洱河地区的诸蛮种落亦有所控制,但其真正占有的新领土还是有限的。吐蕃在这里设置“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即“东境(鄙)”大区下的五个分区,这五个分区只能是集中在河湟吐谷浑故地这一区域之内。可资佐证的是,至少到此时,没有在史籍中发现前文中提到的“北道”、“南道”等名称。

另外,《旧唐书·吐蕃传下》载贞元十八年(802)十二月,在剑南西川战场上,“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热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新唐书·吐蕃传下》则记载了莽热进入剑南道的职衔变化:“时皋围维州,赞普使论莽热没笼乞悉蓖兼松州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引兵十万援维州。”两条资料结合起来可知,论莽热所率十万之众为关内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西北)、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战场上的兵马,因为统领关内道之兵马,职衔是“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当其来到剑南道北部之维州战场,因吐蕃军事制度之传统是以大相统摄全部战场的战术安排,故这时吐蕃对剑南道的军事指挥权自然转入全军的最高指挥官——以内大相兼统帅的论莽热,松州道节度兵马亦归入论莽热统驭。因此,这里的“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与“吐蕃松州五道节度使”并不能因为都由论莽热统领而将二者相等同。

“东境五道节度”与吐蕃的西、东、中、北、南五道并非一回事,这一点从吐蕃各道节度下还有若干 Khrom 亦可得到证明,各 Khrom 以 khrom chen po^② 为长官。因此,吐蕃的“东境五道节度使”可理解为“吐蕃东境节度大使”及其下辖的“五道节度”,即其东境军区下辖五个军分区。职官名称的藏文则分别为 so blon sde lnga 和 khrom chen po,二者是隶属关系。

(四) 吐蕃东境五道节度的渊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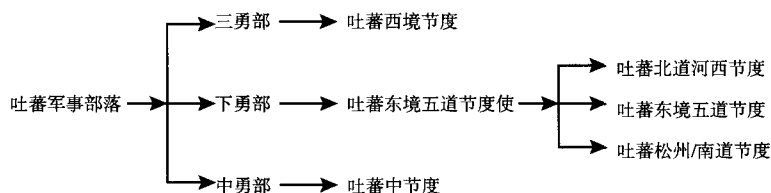
吴均先生认为“吐蕃东道都元帅尚塔藏的管辖区,也就是吐蕃‘下勇部’的辖区。”^③ 这一说法颇具启发性。据《贤者喜宴》记载,吐蕃王朝成立之初,其军事力量有一整套架构体系,即三大“勇部”:“三勇部”(dpav bvi sde gsum)、“中勇部”(bar gyi dpav sde)、

^①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8、218页。

^② 如P. T. 16 (I. O. 751) 中Pl. 12. 33a. 第1行和Pl. 13. 34a. 第3行有dbyar-mo-thang-khrom-chen-po (雅莫塘节度使),参见Macdonald Ariane and Imaeda Yoshiro,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 Paris, 1978。

^③ 吴均:《日月山与大非川——〔日〕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商榷之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下勇部” (smad gyi dpav sde)。三大勇部的具体设置是: “所谓‘三勇部’, 是在昌达巴山 (ri brang stag pa) 以上、门地四柴卡 (mon dbral kha bzhi) 以下, 由没卢氏 (vbros)、琼氏 (gying)、噶尔氏 (mgar)、努氏 (snubs) 及年氏 (gnyan) 等所谓之‘古、久等五部’ (gug cog sde lang) 在此为官 (dpon byas) ……所谓‘中勇部’, 是在贝囊隆山 (ri pe nam lung) 以上、恰贡 (cha sgong) 及佩 (bas) 以下, 由‘十二贝佳部’ (shas rgya sde bcu gnyis) 居此, 并任纳雪 (nags shod) 之官……所谓‘下勇部’在玛朋木热 (rma pom ra) 以下嘎塘陆茨 (ga thang klu tshe) 以上, 由‘通乔九政权部’ (mthong gyab sred sde dhu) 及吐谷浑六东岱 (va zha stong sde drig) 所据……”^① 由这段记载可知, 三大“勇部”相当于吐蕃赞普根据贵族势力的分布所划分的军事卫戍范围。其中的“中勇部”与“吐蕃中节度”对应、^② “三勇部”与“吐蕃西境节度”对应。^③ 而“下勇部”则对应本文所论及的河湟地区。三者在军事扩张的过程中, 由原来的卫戍力量, 转而演变为军事管辖权分别隶属所谓“吐蕃西道节度使”、“吐蕃中节度”和“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的三大进攻力量。结合上文所述军事地理的发展进程, 随着唐蕃交战纵深的不断扩大, 军事地理单元又在西域、河湟、西洱河三大区域的基础上渐渐扩大, 形成西域、河西走廊、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五大区域。与之相应, 在“节度使”的名称上, 也多出了“吐蕃北道节度使”和“吐蕃南道元帅”。据此, 吐蕃节度使制度的具体演进过程见下。



(五) 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的治所

吐蕃东境五道节度的治所, 史籍未有明载。前贤学者做过十分有益的探索, 金滢坤先生认为吐蕃松州五道节度即东境五道节度, 并指出松州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的治所, “松州五道节度使”即是以其治所而得名, 是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名称的另称。^④ 从上述分析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与“吐蕃吐蕃松州五道节度使”为并列级别的军事机构可知, 二者的治所也并非一处。^⑤ 杨铭先生前引文据史料认为在河州可信。

早在禄东赞 (mgar stong btsan yul bzung) 任大相期间, 就控制了吐谷浑的部分地区, 根据吐蕃大事纪年, 从 660 至 665 年, 禄东赞一直驻留吐谷浑, 直到他死的前一年 (666) 才回吐蕃。禄东赞常驻吐谷浑, 一定有固定的指挥场所。后来, 吐蕃在河湟战场上有 so blon

① 巴卧·祖拉陈瓦著, 黄颢、周润年译注: 《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35 页。

② 朱悦梅: 《吐蕃中节度考》, 《民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③ 朱悦梅: 《吐蕃在西域的军事建制及其特征》, 《西域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④ 金滢坤: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 《敦煌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⑤ 金滢坤先生将吐蕃南道节度下的诸道节度与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之下的诸道节度一并考作后者治下。相关考论参见《吐蕃节度使考述》, 《厦门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sde lnga（五道防务相）之设，亦当有专门统理五道之治所。

在汉文史籍中为人所熟知的恩兰·达扎禄恭（ngan lam stag sgra klu khong）还有另外一个汉文名字，即《唐书》中的“马重英”，此名在敦煌文献 P. T. 1388 中也有出现，藏文作 rma khrom。^① 据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兰却加教授告知，这里的马重英并非达扎禄恭的汉文名字，而是“玛曲节度”。这一提示使笔者忽然认识到，原来 Khrom 就是我们常见的“节度”的对译词，而达扎禄恭正是在公元 704 年前后驻“玛曲节度”统领吐蕃东道之军。

如前所述，吐蕃在其东境的军事进攻是持续的，随着军事区域的扩大，军事锋线前移，因而东道节度的最高统帅的指挥部不可能不随之前移。《新唐书·吐蕃传》云：长庆二年（822）“元鼎还，虜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尚塔藏以元帅之职馆客于大夏川。元帅之职，当即《唐蕃会盟碑》中的“天下兵马都元帅”（dmag go chog gi blon），相当于唐制的宰相，^② 亦与上述“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相当。之所以是馆客，而不是驻节，究其原因当与吐蕃军事部落联盟制有关，出征由大相统帅，战事结束大相仍返回中央。

大夏川，见于《水经注·河水二》：“洮水右合二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舍而乱流，迺金柳城南。”^③ 大夏川水即今之广通河。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灭李轨，设置河州，辖枹罕、大夏两县。贞观年间曾废除大夏县，后复设置。大夏县位于“州东北八十里”，^④ 故址即在今甘肃广河县稍北之广通河北岸。这里地处广通河与洮河交汇处，自古即为军事要地，秦汉时期即已设置亭燧。^⑤

尚塔藏驻大夏川，且东方节度诸将之百官僚属汇集于此，并在此地置盟策台，可以说这里不仅是临时性总部，亦应是前方战场固定的指挥部所在，即为分道驻扎地。在吐蕃内乱时，河州沦为诸路势力力争之地，如“会昌三年（843）吐蕃乱，其将论恐热屯大夏，谋并鄯州。鄯州帅尚婢婢遣将庞结心等击之，至河州南，伏兵险阻，论恐热来战，大败”。^⑥ 由是而证大夏川为吐蕃占领整个河湟地区之后的军事重镇，得无可乎！

二、吐蕃东鄙（境）五道节度使的辖域

关于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所辖的范围，学术界有较多的研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通颊五部说。

王尧先生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7X“赤松赞赞事迹”中的“五部通颊”

①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7页。

② 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③ （北魏）酈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159页。

④ （清）顾祖禹撰，贺次群、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57《陕西九大夏城》，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⑤ 定西地区博物馆等：《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3辑，2000年。

⑥ （清）顾祖禹撰，贺次群、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57《陕西九大夏城》。

或称“通颊五千户”与“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相联系。^①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五部通颊”或“通颊五千户”当指五个新占领区，确切地说是河西陇右地区以汉人为主的当地居民按照吐蕃部落制度编置的千户部落。^②这种部落可能也提供兵源，但当以生产型行政部落为主要性质。

第二，《贤者喜宴》中出现的通颊设于边境，除了“五部通颊”外，还出现有“苏毗如包括通颊十一部落”（sum pavi ri stong khyab rgya ldan gyi stong sde bcu gcig）、“通颊九部”（mthong khyad srid sde dgu，属下勇部）等，^③因此，只将“五部通颊”与“五道节度使”接轨恐难成立。

第三，“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使”或“东境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是以内大相身份兼职的，这是吐蕃一贯的军事作战制度。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 T. 1287X“赤松赞赞（742—798）事迹”载：“建立通颊五万部，新设一由抚边大臣管辖之大区。”这一抚边大臣，应当是常驻当地的集军、政、民于一身的派驻大臣，而不是以大相身份兼职的、只在大的作战计划中统领三军的元帅。

第二种观点：吐蕃下勇部说。

前引《贤者喜宴》记“下勇部”的区域为：“玛邦木热（ma bang mu ri，今青海省果洛县玛沁雪山）以下，嘎塘碌茨（ga thang klu tshes）以上，由同乔九部（mthong gyab sred sde dhu）及吐谷浑六千户（va zha stong sde drig）所居之……攻取唐地。”吴均先生认为“吐蕃东道都元帅尚塔藏的管辖区，也就是吐蕃‘下勇部’的辖区”，并指出，藏语碌茨（klu tshes）一词，klu为碌曲，指洮河；tshes为月牙形弯曲处。碌茨，“可能即洮河弯曲处”。^④

第三种观点：河陇地区与瓜沙地区合称说。

杨铭先生认为：“大历十一年（776）吐蕃攻占瓜州以前，吐蕃已于河、陇占领区设置‘四节度’，攻占瓜沙之后，又于瓜州新置一节度使，为了统一在河、陇的军事行动，吐蕃将瓜州节度使划归东境节度使大使统率，故有‘东境五节度’之称。”^⑤

第四种观点：唐蕃冲突地区说。

金滢坤先生认为，吐蕃为了与唐及周边部族作战，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唐蕃冲突地区设置了五道节度大使，专事该地区的军事、民政及对唐与周边部族的外交等事务。吐蕃五道节度大使前后名称及其内部建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改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吐蕃东鄙五道节度使”，下设五“道”节度使，诸“道”节度使下，又设若干小节度使。^⑥

以上对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掌控辖域的研究与探讨，对弄清吐蕃节度使建制的层级与职掌大有裨益。

① 王尧、陈践编：《吐蕃简牍综录》，第25页。

② 荣新江：《通颊考》，《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34、35页。

④ 吴均：《日月山与大非川——〔日〕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商榷之一》，《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⑤ 杨铭：《吐蕃暑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1995年第4期。

⑥ 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笔者赞同吴均先生将“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与吐蕃“下勇部”（smad kyi dpav sde）相联系的观点。

吐蕃自贞观十二年（638）首度进攻唐朝西境，很快便将战火蔓延至与唐王朝接壤的全部区域。由于吐蕃与唐王朝的接壤区域极为广阔，战事活动已不再是部落间小规模争夺，而是有了区域性大规模作战与战略部署的要求，因此发展出区域性大军区独立作战的完整军事体制成为必然。这种军事进程中动态的、具体的内容，少为唐朝方面所知，故早期汉籍极少载及，直到唐代中期以后，唐朝高层对吐蕃军事机构的构成逐渐明晰，而文献记载仍是粗略零散，很难清晰地勾勒吐蕃军事机构的具体建制，但唐蕃间大范围的军事战场及其各自有序的作战步骤是有详细记载的，对重构吐蕃军事管理制度颇有裨益。

三、“吐蕃东境（鄙）五道节度”军事职官体系

“东境（鄙）五道节度使”、“东方节度使”等职官名称，从上引诸条汉文史料所表述的内容看，是吐蕃王朝时期重要的一级军事建制的高级统帅无疑。那么“东方节度”是怎样一级军事机构，对吐蕃军事建制、职官制度以及军事地理范围的划分，都是极其重要的，有必要详细考证。

（一）四方戍边将军（so mthav dmag dpon）与兵马元帅（dmag go chog gi blon）

随着吐蕃军事锋线的扩大，吐蕃军事职官的专门化在职官体系中日渐突出，及至8世纪中期，已经有了专门的高级武职官员。古藏文文献《吐蕃历史纪年》763年（宝应二年，广德元年）条载：“赐大论囊热尔以瑟瑟告身，任其为论……赐悉东赞以松耳石告身，任其为四方戍边将军。”

文献所见较重要的职官有“四方戍边元帅”，藏语作so mthav dmag dpon，^① 陈楠先生指出其“又可称为‘索论’（so blon），职掌守卫边关，管理边防哨卡之事”。^② 除“四方戍边元帅”外，《唐蕃会盟碑》中还有汉文“天下兵马都元帅”（dmag go chog gi blon）、“兵马副元帅”之职官称谓，后者藏文字迹漫漶，王尧、陈践先生将其还原作dmag go chog gi bla。^③

既然有“四方戍边将军”之设，那么是否就应该有四个方面的作战区域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汉、藏史籍中确实存在“吐蕃北道节度”、^④ “吐蕃中节度”、“吐蕃松州五道节度”、“吐蕃南道元帅”^⑤ 等名称。这一系列对应关系，表明吐蕃的军事战略部署确实是按区域划分的。而“四方戍边元帅”或可被认为是吐蕃军事的最高统帅。

①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41页。在新版《吐蕃历史文书》中又译作“四境防戍都元帅”，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00页。

② 陈楠：《吐蕃职官制度考论》，《藏史丛考》，第43页。

③ 王尧主编：《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注15。

④ 《全唐文》卷674，白居易撰《代王伾答吐蕃北道节度论赞勃藏书》；《白香山集》（第二部第六册）卷40，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版，第79—80页；《白氏长庆集》（第三部第八册）卷57，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70b—71b页。

⑤ 《旧唐书》卷140《韦皋传》。

（二）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及其职衔与职掌

“东境五道（鄙）节度使”，即藏文 so blon sde lnga。上文已经分析，这是吐蕃对外军事扩张过程中，设置的军区一级军事建制的长官，除军事指挥权力之外，还兼有民事权，这与吐蕃王朝军事部落联盟的性质相一致，即以行政、军事、生产为一体的管理模式与生产生活方式。其职掌相当于唐朝的军镇节度使。可暂将其理解为受吐蕃赞普及四方戍边将军、兵马元帅节制。

（三）“东方节度诸将”

将“东境（鄙）节度”、“东方节度”视为军区一级军事建制，则“五道”当视为其下辖五个军分区，此说若成立，则当在“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之下的各军分区亦有其各自的军事长官。前引《新唐书·吐蕃传》长庆二年（822）虜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一事中，就出现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是等诸将当即元帅尚塔藏之下的各道节度使及其下属，但由于文献记载阙如，目前学术界根据敦煌出土古藏文文献 P. T. 1217《一封文告的副本》等一批文书，大致梳理出了吐蕃在西域、敦煌一带的军事职官序列，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四、吐蕃东境的五道节度

《资治通鉴》载：大历十一年（776）“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氏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① 金滢坤先生以这里的“吐蕃四节度”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的下属节度，考证出其为故洪、河州、青海、鄯州四个节度。^② 下面，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吐蕃东境的五道节度再作考述，其中金先生所言故洪节度，本文认为其隶属于攻打剑南西川吐蕃南道节度，另文专述。

（一）河州节度

敦煌文书 P. 3770《发愿文》有“何周节度尚乞悉加”一语，何周，当为河州。^③ 如前文所述，其具体所在之“大夏川”当为今广通河谷。P. T. 1081《关于吐谷浑莫贺延部落奴隶李央贝事诉状》有“河州军”（ga cu kun），这里虽称作“军”，但其长官仍用 khrom chen bo（大将军）。^④ 说明此“河州军”与河州节度是一回事。

河州置节度是极有可能的。如前节分析的那样，吐蕃王朝早期在河州一线的进攻非常顺利，武周久视元年（700）时，吐蕃赞普甚至亲征河州。吐蕃的元帅馆客于河州大夏川，建立临时的战区总指挥部，则表明这里至少也是军衙一级的治所。

（二）鄯州节度

《新唐书·吐蕃传》载：会昌二年（842）“别将尚恐热为落门川讨击使……约三部得万骑，击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略地至渭州”。

鄯州节度使设置时间当比前述万岁登封元年（696）要晚，其上限当在广德元年（763）

① 《资治通鉴》卷225，唐大历十一年正月。

② 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③ 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92页。

④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277页。

吐蕃攻取鄯州之后。^①

(三) 青海节度 (khri bshos khrom)

《资治通鉴》会昌二年(842)条云:“是岁,(论恐热)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②除正史外,“青海节度”还见于敦煌本吐蕃文书 P. T. 1288《大事纪年》676 年条:“论赞聂领兵赴突厥,董卜(即赞业)建立青海大行军衙(khri bshos khrom)。”^③按此纪年,则青海节度建于高宗仪凤元年(676),当为吐蕃较早建立的高级指挥机构。

P. T. 1287《赞普传记》(十)有载:“唐之统军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率旅前来,时青海道(mtsho sngan po)将军噶尔·钦陵婆与之对垒迎逆之。”^④这里的“青海道”,应即吐蕃节度制度建立之初的形式。

(四) 野摩塘/野猫川/雅磨塘/雅莫塘节度 (Dbyar-mo-thang-khrom)

野摩塘节度的出处较多,见于如下文献: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斯坦因藏文写卷 IO75 + P. T. 16, 题名为 smon lam du gsol ba (祈愿文),全文 160 行,为一组由吐蕃野猫川大节度使、朵甘思之首领及其全部属民、德论、卡赞大节度使、瓜州大节度使、擘三部落、仲孔玛等,为庆贺吐蕃与唐、突厥三方会盟成功而修建的会盟寺落成时所作的发展文,写作时间确定在 823 年或者其后。文中提到,纪念唐蕃会盟的“会盟寺”(gtsigi kyi gtsug lag khang)建在“吉祥野猫川德噶玉蔡”(bkra shis dbyar mo thang de ga g. yu tshal)。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斯坦因藏文写卷 9, I, 37 (Vol. 32, foll. 88—96), 出土于千佛洞,为一篇发展文,是吐蕃各节度使、部落统帅为庆贺吐蕃与唐、突厥、南诏为会盟成功而在会盟地点修建的寺庙落成时的祝愿辞。文书中曰,寺庙业已建立于扎西雅摩塘平原上。

《达札鲁公记功碑》:“于唐境之野猫川,湟水之滨……”(rgyvi khams su gtogs pa dbyar mo thang/tshong ka phyogs……)。王尧先生指出,《五部遗教·鬼神遗教》记“dbyar mo thang 在青海湖畔”。^⑤

早在吐蕃苯教文献中,野摩塘大平原即非常著名。其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在大非川。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g Heller)认为与都兰对应。^⑥

汉文史料明确记载了唐蕃会盟地在石堡城之西 430 里的“赤岭”(即今日月山)。石堡城即《吐蕃历史纪年》第 43、47 行的 skyi-bu,托玛斯考证其地为“玉园”(g'yu tshai)之所在,而玉园位于“吉祥的夏日草原”(bkra shis dbyar mo thang)、擘三千户部落(phyug tsams)与仲孔(‘brom khong)辖区的交界处,这些地方均属于朵甘思辖境之一部分。^⑦此

① 《新唐书》卷 216《吐蕃传》;《资治通鉴》卷 223,唐代宗广德元年七月条:“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

② 《资治通鉴》卷 246,唐会昌二年十二月。

③ P. T. 1288《大事纪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译文第 89 页,藏文转写第 5 页。

④ P. T. 1288《赞普传记》(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译文第 122 页,藏文转写第 42 页。

⑤ 王尧主编:《吐蕃金石录》,第 75、84 页。

⑥ [瑞士]阿米·海勒著、霍川译:《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⑦ 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II, London 1951, p. 104. 汉译文参见刘忠译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8 页。

外,在《达扎鲁恭纪功碑》中提到,dbyar mo thang与宗喀(tsong ka)相邻。^①宗喀为湟水,有大小之分,大宗喀指湟水下游,即今青海乐都一带,小宗喀指湟水上游,即今湟源一带。故可以推断,盟会之寺庙所在地雅摩塘,当距赤岭不会太远,则雅摩塘在青海湖区域。吐蕃东进唐关陇地区,这里是极佳的军事屯集地,符合吐蕃置节度的条件。

黄维忠、王维强根据《安多政教史》、《塔尔寺志》等文献的记载,考证了吐蕃时期的朵甘思(mdo khams)与明代以后出现的多康(mdo khams)等地名的地望,指出野摩塘(gyer mo tang)为多麦(mdo stod)之名,与朵甘思(多堆 mdo stod 之名)、吉塘(gyi thang,宗喀 tsong kha、安多 a mdo 之名)为多康三岗的组成部分,其“地理分界以黄河为准,黄河以东、以南地区为野摩塘(多麦)、朵甘思(多堆),黄河以北地区为吉塘(安多)。”^②而“多堆”与“多麦”的分界线,任乃强、泽旺夺吉先生认为是阿尼玛卿山,其“东北和东南的地区是‘多麦’,其西为‘多堆’。”^③推而论之,姑且可以理解为雅摩塘大致在川、甘、青之交的一片区域。这里是吐蕃于贞观十二年(638)首次直指唐松州的军事交通路线所在,又是诸羌世居之地,存在置节度使的先决条件。

“雅摩塘”一词用以表示草原之美好,在卫藏也有称为雅摩塘的地方,^④但作为雅摩塘节度,当专指吐蕃苏毗如以外之东北地区的某片肥美平沃的大草原。到底是青海湖南还是在甘青藏交界区域,笔者以为前者恐更合适些。因为在古藏文文献中还有“玛曲节度”节度,从地理名称及范围概念上看,后者的区域更适合被当作玛曲节度的辖域范围。

除上述考论外,关于野猫川的地点还有其他说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马修(Matthew T. Kapstein)认为“德噶玉蔡”(de ga g. yu shal)在今甘肃省安西县榆林窟。^⑤乌瑞教授根据《达扎鲁公记功碑》南面第33行的文字,指出野猫塘地属于唐,在青海湖东北。^⑥谢继胜则认为“野猫川”或为刘元鼎所记的“大夏川”。^⑦2008年北京藏学讨论会上,黄维忠在《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⑧一文中,也认为雅摩塘即大夏川,而雅摩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与会学者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巴桑旺堆研究员则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说:“以一个藏族学者的语感,雅莫塘应该泛指一片很大的地区,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名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周华先生则认为雅莫塘作为地名经常出现于不同的地区,原因是文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家乡与雅莫塘联系起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研究员质疑了黄维忠将雅莫塘等同于“大夏川”的意译方法,认为在汉文译为藏文的过程中,意译是较少采用的一种方式;他还依据《塔尔寺志》的记载,指出了雅莫塘不在河州、而位于塔尔寺附近的可能性。

① 王尧主编:《吐蕃金石录》,第84页。

② 黄维忠、王维强:《藏文 mdo-gams 和 mdo-khams 考》,《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任乃强、泽旺夺吉:《“朵甘思”考略》,《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

④ 今拉萨市噶玛公桑一带亦称为雅摩塘。

⑤ Matthew T. Kapstein, “The Treaty Temple of De ga g. Yu tshal: Iconography and Identification,” 霍巍、李永宪主编:《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27页。

⑥ Géza Uray, Khrom: Administrative Units of the Tibetan Empires in the 7th–9th Centuries, in Michael Aris & Aung san Suu Kyi (eds.),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Oxford 1979, p. 313.

⑦ 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文物》2007年第4期。

⑧ 黄维忠:《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及建制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五）黄河军衙/玛曲节度

玛曲节度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中多有出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龙年（704）“夏，赞普父王驻于‘黄河大行军衙’之‘约弟穷桑’”。羊年（755），“论·绮力卜藏、尚·东赞二人攻陷洮州城堡，收复黄河军衙，尚·多热传今授二人为元帅”。^①

敦煌文献 P. T. 1082 号《登里埃部可汗回文》：“廓州黄河大行军衙（gog chu ma grom）之使者，已去尊驾前，请求去黄河大行军衙（rma-grom）万人部落之驾前。”^②

麻扎塔格出土藏文文献 M. Tāgh. a, vi, 0025 木简：“论措桑致日冲玛函件”。其中“日冲玛”藏文作 rid khrom rma,^③ 可能为“玛冲”的变写，暂存疑。

黄河军衙之所在，从上引“廓州黄河大行军衙”一语所提供的信息，可知当在廓州（今青海化隆西）。《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羊年（755）条在上引文之后，还记录道：“[多思麻之]冬季会盟由尚·野息于若达之廓地（kog）召集之，清点朗氏、末氏获罪遣者之财产。”可见，廓州早在朗氏家族掌权之时，就是一处前沿指挥机构所在。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包括洮水流域在内的黄河沿岸地区。

《旧唐书》载：建中元年（780）“四月，韦伦至……赞普乞立赞谓伦曰：‘……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命辄已；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④ 这里的山南之师是否能与玛曲节度相对应，未可知。安史乱后进入关内的吐蕃节度有四，郭子仪云：“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入近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⑤ 这四节度当出自吐蕃东境节度，而在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中，只有玛曲节度从地理方位和条件上最适宜进入扶（州）文（州）战场，而其余四节度可能就是郭子仪所云之开赴陇东及漠南地区的兵力。另有一支开赴河西的兵力当为东境五道所辖，但进入河西走廊后，重新组建了“吐蕃河西北道”之诸节度，故郭子仪所言四节度只可能是从吐蕃东境五道中所出。当然，这只是依吐蕃东进的军事地理进程进行的推断，是否可靠尚需进一步考证。

五、吐蕃节度与吐蕃军事制度的新特征——军区化、集团化

从上述对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的分析可知，吐蕃军事体系是从部落联盟的贵族化管理向军事区域化管理演变，并在部落军事联盟时期形成的三大“勇部”基础上，形成东境节度、中节度和在西域由若干道节度组成的军事区域管理体系，而随着吐蕃东境节度活动纵深的不断扩展，又分离出北道和南道节度使。这种军事区域划分与管理模式的形成，不论是否模仿了唐朝的节度使制度，都可视为其军事地理进程中不可避免并最终要实现的。而军事区域化管理的结果，无疑也是军事集团化的开始。吐蕃晚期，特别是朗达玛朝结束时吐蕃军事势力

① P. T. 1288《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译文第99页，藏文转写见第8—9、18页。

② P. T. 1082号《登里埃部可汗回文》，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汉译文第292页，藏文转写见第222页。

③ 王尧、陈践编：《吐蕃简牍综录》，385号，第68页。

④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⑤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的分裂,正是其集团化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

吐蕃诸节度使分管区域的划分,标志着吐蕃军事已经军区化、集团化,虽然还是建立在部落制基础之上,但却是一种军事规范化的进步。而军事规范化的直接体现,必然是军事化体系与民事体系的逐渐分离,吐蕃军事行动从全体部落随军出行到选择专职的“奴”相随,正是这一发展的脚注。

吐蕃军事行动在早期的主要表现是“辘重疲弱”^①与参战士兵的一体混杂,即士兵在前方打仗的同时,部落老少及财产相随,故常见前方军队败退之时,“辘重疲弱”为唐军所缴的被动局面出现。而后来,唐朝史家所观察到的吐蕃军事制度是“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时散处耕牧”。^②这种相从之“奴”显然与先前的“辘重疲弱”不同,奴们虽然在平时亦散处耕牧,但已是军事后勤的专职人员,而不是早期疲弱的父老家眷了。

专职随军“奴”的出现,亦与吐蕃“桂”、“庸”之分不无关系。《贤者喜宴》记载:“所谓‘桂’(rgod)者,即高等属民(‘bangs rab tshan),从事军务者之名称(dmag gi las byed pavi ming)。这些桂,据谓有六十一东本(sdong dpon)……再者,所划分的‘雍之人部’(gyu gu mu sde),此即称之为‘雍’或者‘更’(gyung ngam geng),这些是做属民事务的人员名称。此亦即所谓的‘扬更’(yang heng)、“扬阐”(yang bran)及‘宁悠’(nying gyog)之名称是也。”^③

《贤者喜宴》记事风格是常把吐蕃王朝时期的制度、区划等全部注记在松赞干布名下,仿佛吐蕃的所有法律、制度等都在松赞干布时期即已臻于完善。而实际上,许多法律、制度和区划都是在王朝时期逐渐成熟、完善的。这些记载虽言简意赅,但脉络欠清晰,如“下勇部”所包括的“同乔九政权部”(mthong-khyab-sreng-sde-dgu)及吐谷浑六东岱(va-zha-stong-drug),^④当在芒松芒赞(650—679年在位)时期完成编制的,也一并记在了松赞干布身上。

桂庸的正式出现,还表明吐蕃兵源招募制的开始,这在吐蕃部落军事制度史上是一新现象,较之原先以集生活、军事、管理于一体的部落制军事体系而言,军事化程度明显加强,这是吐蕃军事进程发展过程中,随着军事区域的扩大,军事部署对军事化要求提升的表现。“桂”与“庸”之属军事单位的出现,既是军事制度在部落制基础上向域外扩充军事基地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新事物,也是吐蕃军事管理区域化、集团化模式的适应性、傍生性的产物。

[本文责任编辑 刘清涛]

① 开元十四年之甘州战役,参见《新唐书》卷216上《吐蕃传》。

② 《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

③ 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34页。

④ 参见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第35页。